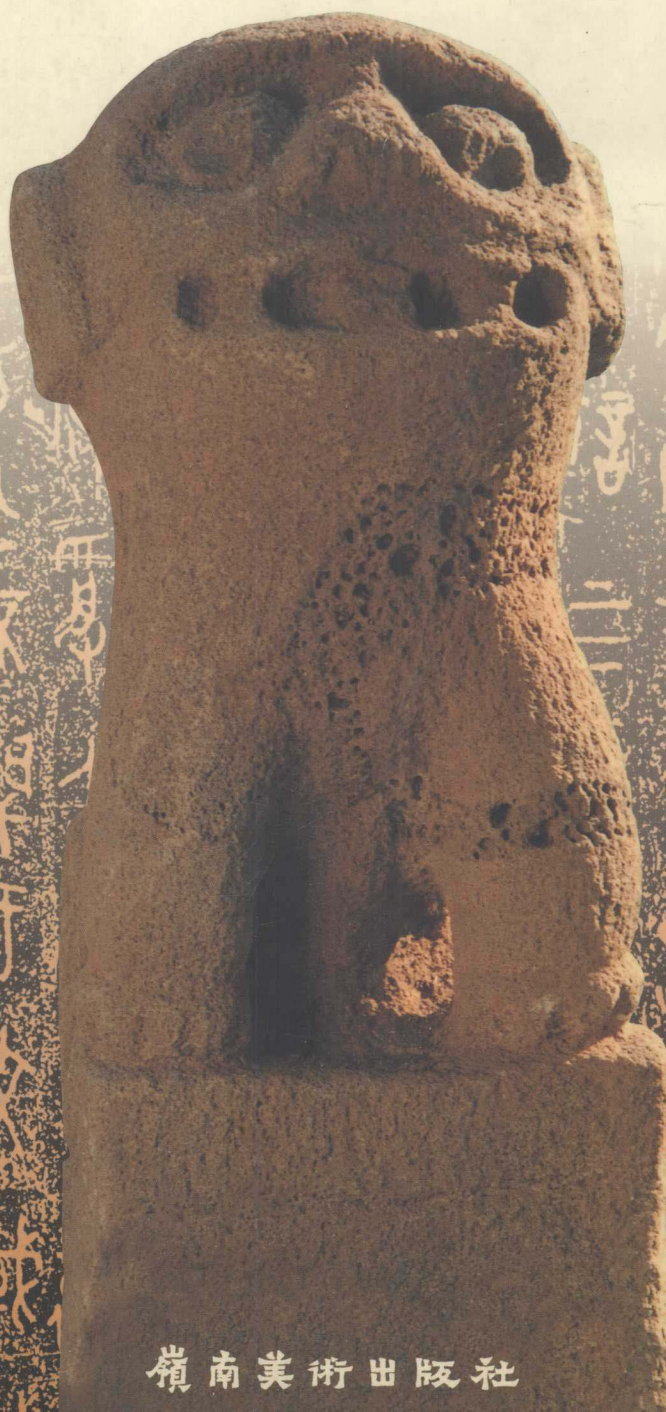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

雷州半岛石狗文化

湛江市博物馆 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雷州半岛石狗文化/湛江市博物馆编. —广州: 岭南
美术出版社, 2003.2

ISBN 7-5362-2554-7

I .雷... II .湛... III .石雕-雷州半岛-图集

IV .①J323②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002555号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11号9、10楼 邮编: 51007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次: 2003年2月第一版

200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67 × 1092mm 1/16

印张: 5

ISBN 7-5362-2554-7

定价: 80.00 元

后记

关于雷州半岛石狗文化的研究，是湛江市博物馆一项科研项目，课题主持人娄欣利，馆内其他几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由于各人观点的差异，因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结论有别。我们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的原则，尊重作者的观点，不强求一致。

本书图片解说第37页至第55页由剧作家、湛江戏剧家协会主席卢凌日撰写，第56页至第77页由青年作家、诗人邓亚明撰写。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雷州市博物馆和徐闻县博物馆等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这里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2年11月28日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康寿	
副主任	张建渝	郑日就
	杨一平	阮应祺
委 员	冯兆平	叶彩萍
	娄欣利	杨晓东
	林臣勇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序

■李康寿

湛江，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上，她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崛起在南海之滨。

然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湛江这块自古以来就是被贬官员流放的所谓“南蛮”之地，有历史吗？这块远离中原华夏文明的化外之境，有文化吗？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没有根基的大厦，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湛江，难道就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不！湛江的考古工作者、湛江的史学工作者、湛江的文化工作者，为拂去蒙在湛江身上这层厚厚的尘埃，还湛江的历史真面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从不同方面以不同视角对湛江的历史文化作出卓有成效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湛江，一个闪烁着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的湛江，一个充满现代沿海城市魅力的湛江。

由此，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一套《湛江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为基础，全面展示从遂溪鲤鱼墩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开始至今的五千年前湛江人类文明史，展示多姿多彩的湛江古代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示多元化的当代文化的新成就。

这套丛书，以学术性、艺术性、形象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为特色，既有科学的严谨的学术论文，又有大量富于形象性的摄影图片，还有极富文学色彩的图片解说。我们希望在阅读学术论文时的艰辛和枯燥能在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文学语言中得到消解，从而引发和加深对湛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兴趣和了解。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科学的原则，实事求是，以文物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批判继承的原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容许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强求对问题的统一认识。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是一项以弘扬湛江传统历史文化为宗旨的长期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将在对湛江历史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每年出版一到三本，积十本为一辑。从今年开始，将陆续推出《雷州半岛石狗文化》、《雷州窑瓷器》、《湛江新石器时期考古》、《湛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湛江古代文化名人》、《湛江古建筑》、《湛江版画艺术》、《湛江盆景艺术》、《下四府粤剧》、《湛江傩舞》等，而更多的选题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参与。

湛江的经济建设正走上快车道，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我们期望这项文化建设工程对提高湛江市人民的素质和培养更多精英人才产生积极的作用。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从洪荒到现代文明，石狗曾经被一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文化群落尊为守护之神。看到了没有，它一副高傲自得的样子，口中喃喃有语：“别小看我的笨拙！”

通高：57厘米

座高：5厘米

藏于湛江市博物馆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

雷州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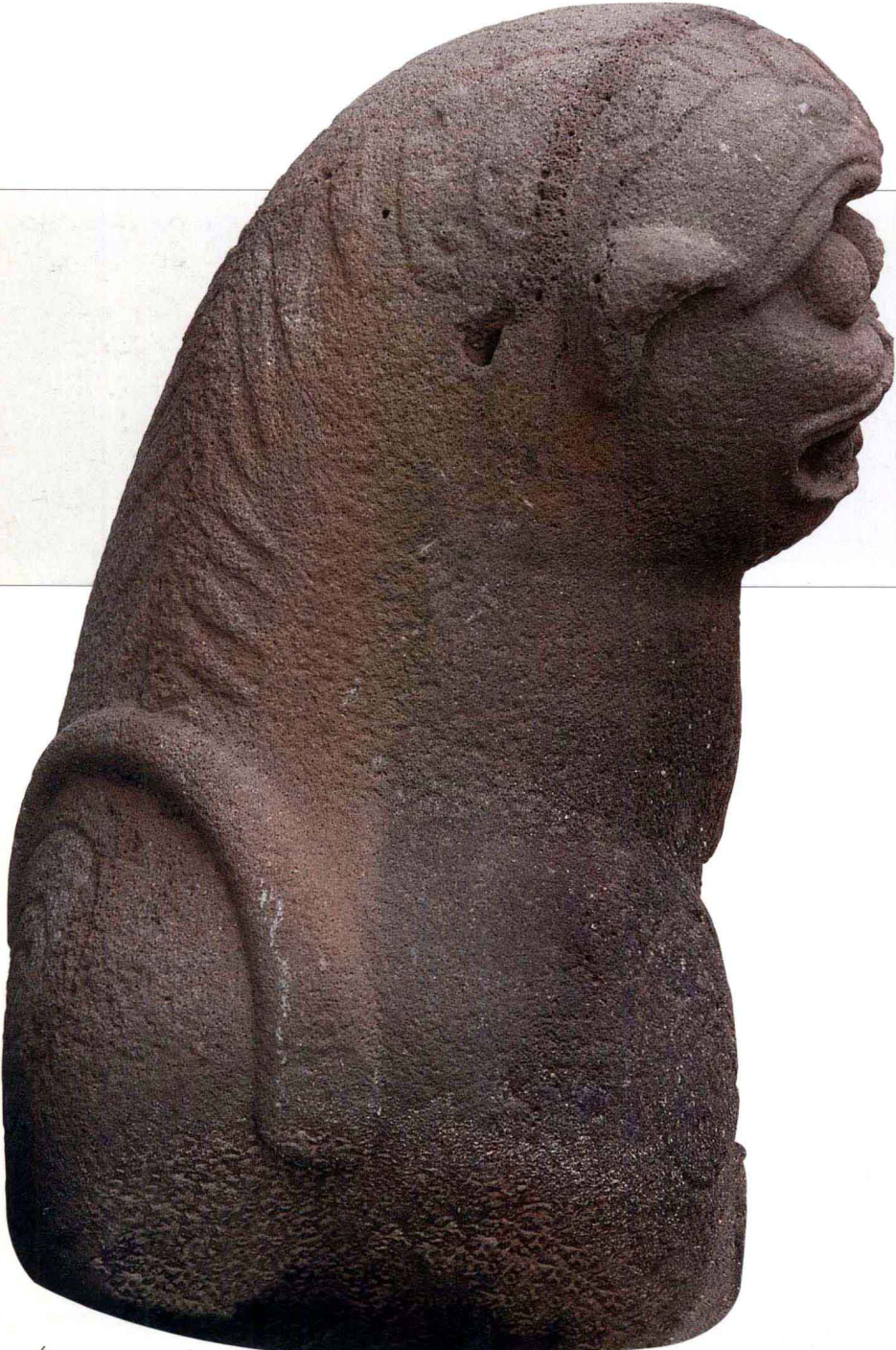
石狗文化



湛江市博物馆 编

娄欣利 主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前言

■湛江市博物馆馆长 冯兆平

雷州半岛地处祖国大陆的最南端，春秋战国属楚界、秦汉为南越象郡，是百越聚居之地。上古时代，人们的思维发展处于原始状态，面对自然界发生的现象迷惑不解，而臆造某一物象或籍以某一物象为图腾，作为自己向自然界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庇佑与精神力量，因而各个部族都有自己信奉的图腾。狗是不是雷州先民的图腾，虽尚未定论，不过长期以来，雷州半岛人民发挥智慧与创造力，雕刻了千姿百态、神采奕奕的石狗，奉置于村头、巷口和门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雷州石狗文化。目前，分布在雷州半岛大大小小的石狗近万只，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湛江市博物馆，为配合湛江市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保护珍贵的雷州石狗文化遗产，组织了本馆的研究人员，深入到雷州半岛农村和彼邻的广西、海南岛进行调查研究，从文物历史、艺术欣赏等多角度探讨雷州石狗文化的构成与内涵，更进一步诠释雷州半岛包纳、兼容的文化特性。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现在的成果。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为弘扬湛江传统历史文化，提升湛江的文化品位，产生积极的作用。



雷州半岛 石狗文化漫谈

■ 娄欣利

雷州半岛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北与广西毗邻，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在雷州半岛上产生、形成的雷州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自成格局。雷州先民以南越土著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福佬文化、荆楚文化为主导，与各种外来文化经过长期融汇、交流，最终创新、整合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体系——雷州文化，而盛行于雷州半岛的石狗文化正是体现了其包容、兼容的文化特性，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雷州半岛的徐闻、雷州、廉江、遂溪等地乡村的村头、巷口、房屋门前、水塘边至今仍然可见大量形态各异、刻工粗犷的石狗，虽历经岁月风雨，依旧默然蹲立守护，构成了雷州半岛城乡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景线。目前，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市博物馆等文化、文物部门正展开雷州石狗的征集保护工作，现已收集到造型古朴、栩栩如生的石狗近500只，绝大多数由玄武岩雕刻而成，其形态基本上是前腿向前撑直，后腿弯曲呈蹲坐状，昂头，尾巴往上翘贴于背后，部分石狗露出雄性生殖器。其中最大的石狗连座高约130厘米，最小的仅高10厘米左右，一般的石狗跟真狗大小差不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雷州半岛遗留的石狗近万只，大部分散落乡野荒郊、村头巷尾，雷州石狗的保护与研究任重而道远。

遍布乡野的石狗并不是雷州半岛独有的文化现象，笔者经过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的文化民俗资料发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南、西部以及海南省北部地区的乡村、城镇均有为数不少的石狗存在，但两地石狗的造型比较单一，雕刻手法写实，体态瘦小。另外，据介绍，在云南省文山、广南壮族自治县、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南海等地甚至东南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也有少量石狗发现，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有更多的地区加入到石狗文化流行圈的大家庭。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相互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文化也是如此，它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时间沉淀的结果。文化不是短时期内出现的，有其历史的阶段性、连续性和继承性。因此，研究文化不可能割断历史，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状况深入探究其产生根源、发展演变规律等相关层面，全方位、立体地剖视其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准确无误、全面客观地揭示、还原文化现象的本来面目。

雷州半岛的石狗文化流传已久，其产生的思想基础与雷州先民的图腾崇拜有莫大的关联。后随着多民族的古代居民的衍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嬗变，在明清时期，由于道教风水堪舆术的广泛流行传播，促使“狗”图腾由神坛走向民间，成为雷州居民镇邪避灾之物。遍布雷州半岛城乡的石狗就是图腾信仰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它所见证的则是多民族融合、多种文化交汇升华的历史进程。

一、石狗的发现与分布

目前，经过文物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在雷州半岛徐闻、雷州、遂溪、廉江等县(市)的城镇乡村调查发现了大量石狗，其中以徐闻县迈陈镇、角尾镇；雷州市龙门镇、覃斗镇、乌石镇、英利镇、调风镇；遂溪县江洪镇、草潭镇；



廉江市营仔、横山镇、良垌等地石狗数量为多。现仍有大部分石狗掩埋地下或由村民自行保管,有待进行深入的调查和保护工作。雷州半岛石狗的分布并不均匀,呈现沿海多、内陆少、西部多、东部少的分布特点,不同地域发现的石狗形态差别很大,区域间发展演变的序列特征比较明显。一般发现石狗的村庄建村年代都比较早,最迟也在清末民国时期,建国后搬迁而来的村庄基本上没有发现石狗。

为进一步开展石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2002年10月期间,在省市文博同行师友的帮助下,笔者根据相关线索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两地石狗相对集中分布的地区进行了初步的走访调查工作。

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实地调查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石狗集中分布在红水河以南、湘桂线以西的地区,即广西的中、西、南部壮族聚居区,其中在上思、宾阳、来宾、大新、田阳等县(市)有较多石狗发现,而其东北、东南部汉族聚居区则极少或没有发现;海南省的石狗集中分布在北部地区的儋州、琼山等县(市)并以儋州市三都镇、中和镇、长坡镇数量居多,仅中和镇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就发现石狗、石敢当近20座,而且大部分仍享用着当地居民供奉的香火。

海南、广西、广东雷州半岛发现的石狗数量多、分布广,由于受相邻地域空间、相近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得目前三地发现的石狗虽形态上有所差异,但其功能作用、摆放位置、流行时间、制作工艺却大体相近,同时这些内部特征也为研究石狗文化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雷州半岛石狗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狗作为雷州先民的图腾崇拜为石狗文化的出现奠定厚实思想基础。

“图腾”(Totem)一词源于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最普遍的宗教崇拜形式之一。图腾信仰者坚信人类群体与作为图腾象征的某种自然物类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超自然的血缘关系。他们常常把图腾作为本民族或氏族的标志,敬奉该图腾物类为自己的先祖,并相信其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会对本氏族成员起保护作用。蛇、青蛙、鸟、熊、狗、树木等动植物都曾经被某些民族作为图腾崇拜,而其中狗则是这些图腾物类中普遍使用的物种之一,后历经演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蔚为大观的狗文化现象。

1 狗,亦称犬,是人类最早豢养的动物之一,在原始社会早期的经济活动中担负着重要角色,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生命安全的保护者,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以狗为图腾的多数为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游耕民族。古籍中以犬为图腾的民族或氏族的记载甚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则是槃瓠崇拜,且以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南蛮列传》的记载较为详细:“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妾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

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2]

雷州半岛偏于岭南一隅,古属“百越之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大体上,今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以至越南北部地区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族系,通称为百越。战国时百越“朝服于楚”,属楚国的势力范围。百越之中,南越、闽越、骆越、西瓯等交错分布在不同区域。秦汉以后,百越各自发展分化。隋唐时期,越族概念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俚僚”的称谓,“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獠、曰俚、曰僚、曰谿,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4]据《太平寰宇记》载:雷州“人杂夷僚”。[5]此“夷僚”应是“俚僚”。另据明庄元贞《雷祖志·卷一》载,隋唐雷州半岛“州旧有獠、獠、峒、獠与黎诸贼不时劫掠”,可见当时仍有少数民族在活动。后随着宋元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北方移民主要是闽南莆田人的大量迁入,多民族融合分化发展的步伐加快,雷州半岛的“俚僚”逐渐被汉族同化,随同其他地区的百越先民最终演化成为如今苗、瑶、壮、侗、布依、黎、水等诸民族的先民,分居在今广东、广西、海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

神犬槃瓠的图腾崇拜对百越演化而来的多个民族影响颇深。据《魏书·僚传》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



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抱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买取猪狗而已。”[6] 僚人这种杀父可以用狗来谢罪，足以说明僚人心中狗与人的地位同等重要。另清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载闽粤山中的瑶人、畲人：“每值正朔，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7] 时至今日，苗、瑶、畲、傣等少数民族中仍留存着神犬槃瓠图腾崇拜的影响，保存有《祖图》（神犬槃瓠传说的连环图画）和《狗皇歌》，所流传记载的故事情节与古籍所述相差无几。他们心理上认同神犬槃瓠就是自己民族的先祖，并尊崇

狗为保护民族兴旺的神物而顶礼膜拜。过去雷州人同样尊狗敬狗，不吃狗肉，杀狗不允许在屋里或村里进行。后来受大量涌入的不同信仰、不同饮食习惯的外地移民的影响以及狗肉食用和入药后有“安五脏、补绝伤、轻身益气、补胃气、壮阳道、暖腰膝、益气力”等诸多健身祛病的功效[8]，开通、务实的雷州人便也开始坦然地食用狗肉。但即使在“白斩狗”美食流行的今天，雷州半岛还是有很多人只能店铺档口吃狗肉，绝对不能拿回家里享用，甚至吃狗肉后就不允许进入祖庙、宗祠，狗图腾崇拜遗留的影响可见一斑，因而石狗成为辟邪镇灾的神物亦不足为奇了。

（二）长期以来狗作为辟邪致吉、昭示天意的灵物为石狗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狗作为守护安宁、辟邪致祥的吉物自古有之，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狗来守护死者的灵魂，四川巫山大溪遗址M55的两侧就发现各殉葬一狗[9]。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商人墓葬中一般都有腰坑来殉葬狗[10]。这些都是用狗来护卫死者灵魂平安的表现。

狗能辟邪的风俗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史记·秦本纪》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此后以狗辟邪之风越传越盛。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记述当时世人多“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齐梁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真诰》中说：“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可以辟邪。”而后世道教方术家在设坛作法时，均据此采用白鸡白犬。随着道教文化的流入传播，狗能辟邪的观念逐渐被雷州先民接受。

狗何以能辟邪？一般认为狗是斗精幻化而生，属纯阳之物。《春秋考异邮》说：“阳气通，故斗运。狗三月而生，阳主于三，故狗各高三尺。”古人认为阳定胜阴，妖魅邪怪属阴，自然怕纯阳之物——狗。另外，也有人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概念以及天狗的传说解释狗能辟邪的缘由。尽管诸种解释各有不同，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深广。我国北方地区相传灶王爷下凡保佑家家户户平安时，便有金鸡玉犬辅佐。乃至今日，大江南北很多地区建楼盖房之前，仍保留着杀狗求吉、淋狗血以辟邪的风俗。

古人多为“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信仰者，而狗就是最能够反映天意的灵性动物之一。很多历史人物的诞生或建业都与狗的灵性有关，狗也因此

不断提升其社会地位，得到善男信女的推崇和敬拜。

雷州半岛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夏秋间雷暴频繁，灾害严重，因而雷州先民敬畏雷神。封建社会，雷神被赋予人格化的形象，并使之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复杂的人格化”[11]。于是乎本地功绩卓绝、历代敕封的唐代雷州首任刺史陈文玉便顺应天意，成为雷神的化身、雷州人的祖先。“陈文玉，海康人，世传陈太建中，其家出猎得巨卵，携之置诸庭，雷震卵圻，得一男子，即陈文玉也，少而明敏，长涉猎书传，唐贞观时，辟茂才，任本州刺史，精察吏治，寻访境内乡民疾苦，怀集峒落，诸酋相继输款。厥后，乡人立庙塑像祀之。”[12]

雷祖陈文玉任职刺史期间，精察吏治，体恤民情，政教并行，雷州大地民皆富庶、安居乐业。雷祖在仙逝之时“即生两翼，白日升天”，极具神奇色彩。后又受到历代帝王加封。陈文玉在雷州先民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他的诞降又同“九耳异犬”的先天灵应是分不开的。据《雷祖志》载：“(雷)州西南七里，有村曰‘白院’。其居民陈氏，讳鉷者……鉷业捕猎，养有九耳异犬。耳有灵机，每出猎，皆卜诸犬之耳。一耳动，则获一兽，二耳动，则获二兽。获兽多寡，与耳动之数相应，不少爽焉。至陈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辛卯，九月初一日出猎，而犬之九耳俱动。陈氏喜曰：‘今必大获矣！’ 鸬

其邻十余人，共随大往。至州北五里东，地名乌仑山，有丛棘密绕，犬自晨吠至日昃，无一兽出，猎人奇之，伐木而视。犬挖地开，获一大卵。围有尺余，壳色青碧，众俱不知为何物。陈氏抱而归家。次早，片云忽作，风雨雷电交至。陈氏大恐，置卵于庭，盛以小棹，遂为霹雳所开，内出男子。两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男子交还陈氏养育，名曰文玉。”[13] 如今供奉陈文玉的雷祖祠内仍见两只威严肃穆



的石狗，虽为后世补造，但狗的灵性与雷州先祖陈文玉神诞的关系不言而喻，使得雷州居民对狗能辟邪致吉、昭示天意的神奇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后世盛行的石狗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三)明清时期佛教、道教深入传播影响，加之风水堪舆术的广泛流行，为雷州半岛石狗文化的盛行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宗教信仰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宗教是在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





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4] 雷州半岛偏处岭南，其雷多地瘠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早期人类对神秘的自然界产生敬畏心理，各种宗教信仰也由此交互融摄、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着雷州先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道教是封建社会雷州半岛盛行的主要的宗教信仰，两教此消彼长、更迭交错，相继影响、控制着雷州先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它源于以万物有灵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

揉和了多种信仰而成的具有多神和自然崇拜形式的开放性的人为宗教。道教在雷州半岛传播已久，始建于宋的雷州真武堂、灵冈庙就是著名的道教文化景观。明王朝定道教为国教，积极利用道教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由于明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地方官吏乡绅的竭力仿效和推广，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快速发展和深入传播，尤其是作为道教方术之一的风水堪舆术愈演愈烈，迅速在社会各阶层蔓延开来，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风水，旧称“堪舆”，也指相宅、

相墓之法，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风水理论初步形成，晋代以后堪舆之风大盛，经过唐宋时期风水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至明朝时，风水术作为道教方术之一，已远远超出相宅、相墓之法所认为住宅或墓地周围的风向流水等形势能招致主人祸福的思想局限，逐渐演变扩充为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成为古代居民聚落选址、布局及空间发展模式的依据。

风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风水中的吉凶观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理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愿望，为了辟邪镇煞、逢凶化吉，一般会借用风水建筑、石敢当、八卦镜、镇符等来达到弥补地势、改变运程、抵御凶煞的目的，因而每于村落入口、门前巷口和凶宅附近的正对吉方处，常见石敢当立于此。石敢当是道教常用的辟邪镇灾之物，在长江以南地区较为多见，一般有石人、石狮、片石等多种象征物。最早的石敢当见宋代王象之著《舆地碑目记》记载，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福建莆田县令在县衙附近修石敢当，其上刻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另据《继古丛编》载：“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

有关石敢当的传说很多，有的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当时蚩尤凶暴，头角无敌，黄帝屡败其下，某次蚩尤登泰山而渺天下，自称天下无敢当，女娲乘机投炼石以制其暴，上镌“泰山石，敢当”，致使蚩尤受挫被擒。另有传说认为“石敢当”为山东泰山人氏，他胆大无畏，生平逢凶化吉，善擒妖邪。各地都请他降妖除邪，因而应接不暇，于是



人们只好在大石头上刻上他的名字，立于当冲处以压邪镇宅。

石敢当本身是块石头，但其规格有制，《鲁班经》所记的规制是：“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入土八寸。”一般上刻“石敢当”字样，也有刻“不敢当”或“泰山石敢当”，意

味着借助泰山奇异神力而所向无敌，来镇治各种难以名状的神煞鬼怪，抵御不同方位的恶气凶煞，这显然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种追求平安吉祥心理的表现。

道教的风水理论在长期的发展传播中渐渐分化成“理气派”和“形法

派”，而其中坚持“气有方位吉凶”观点并多用石敢当等来镇治凶煞的方位理气之法以福建最盛，故后人多以福建学派相称。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因此用石敢当辟邪的方法古以福建一带及相邻的安徽、浙江等地民间最为常见，受其影响，台湾地区石敢当文化也相当发达，如今澎湖、宜兰等地仍然可见大量各种形制的石敢当，据不完全统计，仅澎湖地区就已发现500多座石敢当。另外，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发现有此风俗。

唐宋以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雷州半岛，主要是来自闽南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并以兴化府莆田人居多，先后定居于雷州半岛沿海各县。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中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就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情况。福建人大量涌入雷州半岛的移民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福建人南迁不仅带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固有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笃信道教风水堪舆术的闽南人用具有神异力量的石敢当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雷州半岛土著居民的思想认识和世俗观念。在长期的融合、交往过程中，雷州先民以狗为图腾的信仰也逐渐为不同文化的外地移民所接受、认同；再加上雷州半岛古越人遗传的迷信风气盛行，根深蒂固，相沿成习，“雷俗崇信巫覡，陋澁之间，丛祀迭起，溯其由来，茫无援据而泯。”^[15]由于明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推行以及深谙风水术的福建人的南迁，雷州半岛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也成为道教风水堪舆术

盛行、泛滥的地区。兴建于明后期万历年间的诸多风水塔,如:雷州三元塔、徐闻登云塔、吴川双峰塔等就是封建官吏为弥补风水缺陷、地势不足,祈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倡议修建的。另外风水堪輿术所标榜的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如何趋吉避凶以期保证人事顺利的原理,恰好与农耕文化下的普罗大众所追求的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人文发达的生活目标相吻合,因此,在明清时期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雷州先民的狗图腾信仰便与外来的石敢当风水文化相结合,渐变衍化而成具有辟邪镇灾功能的石狗,并迅速发展、蔓延到村落乡野,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奇冠天下的雷州半岛石狗文化。

石狗是外来的石敢当文化在雷州半岛的衍化替代物,两者具有相近的辟邪镇灾之功能,因而一般也都放置在村头、路口直冲处、房屋门前、水塘边等地方。笔者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在湛江市郊旧县村村口、雷州市覃斗镇港头村、上言村的村口、乌石镇文化馆门前交叉路口、徐闻县城民主路潮州会馆水井边的三叉路口、雷州市养马坡巷20号住户门前甚至在湛江市麻章区文章村村口的大榕树上、太平镇通明港村村民房屋的院墙和屋顶等诸多地点,至今仍有肃穆神异的石狗忠实守护。这些石狗多数为蹲坐,也有呈伏地冲击状,所面对的方向与村向或房屋大门的方向一致,明显具有守护村庄或房屋和辟邪镇宅的性质。

另外,石狗与石敢当并用的情况在雷州半岛、广西、海南等地都比较常见,雷州市深府街就发现“泰山石敢当”碑与石狗并排面对直冲的巷口,广西壮族象州县、大新县、上思县、宾阳县,海南省琼山市、儋州市的三都镇与中和镇等诸多地点都有类似的

现象。相当部分的石狗身上刻“石敢当”、“泰山石敢当”、“王”、“八卦”等字样,还有的石狗胸前或基座上刻有八卦图,辟邪驱魔的意图十分明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石狗与石敢当两者之间的发展承继关系。

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雷州半岛的石狗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神圣天职。在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村口,自明代起就有石狗镇守滔滔奔流的南渡河;附城镇的东门至今仍见两只石狗守望着万亩良田;另外在雷州英利镇南包村附近发现的一座民国五年修建的坟墓围栏前,一对威严的石狗依然机警地保护着墓主的安宁。

雷州半岛有关石狗的风俗和传说也相当多:解放前天旱乞雨,人们便将小石狗周身涂满泥浆,由多名童子抬着游街,用树枝抽打石狗并求喊“天公下雨”,以期打动石狗在天庭的兄弟——天狗求众仙家布云施雨,缓解旱情;众多体型健壮、生殖器硕大的石狗前,经常有人供奉香火,望能祈福送子。据介绍,雷州市覃斗镇港头村村口石狗的鼻子曾经被对面村庄的村民打烂,原因就是石狗正对其家门,镇治他的风水吉位,所以想尽办法搬移石狗所致。雷州半岛石狗的神异作用,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广为传用。

石狗的产生虽然与道教有直接的关系,但其造型风格、艺术手法或多或少受到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佛教的影响。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却一直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相互倚托、渗透传播。宋元以来,雷州半岛佛教流行,寺庵迭起,蔚为风气,延续至今。嘉靖《广东通志·风俗》说雷州地区“自梁唐以来,寺观庵堂半民居”[16]。据统计:雷州市自1982年恢复佛教协会后,全县有大小寺庵66所,常住僧191人,

尼392人,居士340人,出家人数几乎占全省僧尼一半,由此可见雷州半岛佛教传播之广、影响之深。[17]

狮子是佛教中比较常见的象征性艺术形象,并被引喻为佛。《大智度论》云:“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西汉时,西域就已向汉朝献狮,直到东汉才有明确的记载。滨海地区的安息国,于章和元年(公元87年)、“遣使献狮子、符拔”。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18]。我国东南地区出土的汉代动物造像中就已经发现狮子,如:江苏苏州虎丘出土的西汉时期狮形铜座、江苏徐州东汉早期墓葬出土玉石雕刻的狮子就是最好的例证[19]。随着佛教的传播,狮子的形象也更加广为流传,后道教也借用作为宫观山门前的装饰,一般两只成对,东边为雄狮,左蹄下踏一绣球,俗称“狮子滚绣球”,象征浑元一体和无上的神权;西边为雌狮,右蹄足踏一只小狮,俗称“太师少师”,象征道门昌盛。与道教风水术颇有渊源的石狗,自然受到佛教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再加上明清时期雷州半岛农业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宗教文化的创作、传播比较活跃,与同时期的广西、海南等地相比,雕凿石狗的雷州本地工匠更多地借鉴、采用佛教文化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得数量众多的雷州石狗身上可以轻易地发现狮子的形象特征,不能不令人慨叹雷州先民自由挥洒的创造力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禀性。

三、雷州半岛石狗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的石狗是雷州半岛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湛江旅游资源一笔宝贵的资产。为了更好地研究与